

别把申遗变成生意

汤嘉琛



今日论语

随着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相继申遗成功，拥有 52 处世界遗产的中国成了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近几年，中国在申遗热潮中捷报频传，越来越多的自然和文化遗产得以向全世界推广，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在这种狂喜的氛围之中，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那句“不要把申遗作为政绩”的提醒，真可谓振聋发聩。

中国各地政府热衷于申遗，与上世纪 90 年代旅游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山西平遥古城在申遗成功之后游客量暴涨数十倍的“佳话”，更让许多地方官员意识到“世界遗

产”认证是一块拉动旅游经济的金字招牌。在这种功利的政绩观的指导下，将申遗当成一种生意，正是当前中国申遗与遗产保护工作最突出的问题。

申遗在中国有多热？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有 200 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有 59 项，其中包括 27 项文化遗产、16 项自然遗产、16 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按世界遗产组织的规定，中国完成这些预备申遗项目至少要 30 多年。尽管如此，各地对“申遗竞赛”仍乐此不疲。

究其原因在于，很多地方主政者认为申遗是一门划算的生意。从媒体报道看，各地在申遗方面的投入，少则数亿元，多则几十亿、上百亿元。几年

前，陕西为推动丝绸之路申遗，曾投入上百亿元修复未央宫遗址，当地官员笃信只要申遗成功就能回本。西部一些贫困地区，也将烧钱申遗当作一种实现“弯道超车”的捷径。

这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套路，为诸多申遗乱象埋下了伏笔。一方面，不少地方为申遗成功不择手段，暴力强拆、数据造假等问题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很多地方申遗成功之后就开始圈地收钱或门票提价，陷入了“重开发，轻保护”的误区。2007 年，丽江古城等 6 处世界遗产，就曾因过度开发而被“黄牌警告”。

客观而言，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并非截然对立的关系，适度、合理的开发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遗产保护工作。现在的问题是，一些

地方官员忘记了申遗的初心，片面追求申遗的商业价值，实质上对那些文化和自然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我们已多次遭到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批评，这让作为遗产大国的中国很尴尬。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要出发。”在当前这股申遗热潮中，最不能忘记的是我们申遗的初衷，最该端正的是我们申遗的动机。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遗产保护是中国必须做好的一项传承性工作。如果把申遗当成生意、当成政绩，把遗产保护变成某种“烧钱竞赛”，很可能让那些真正需要保护的珍贵遗产失去被保护的机会。对申遗和遗产保护的种种乱象及时纠偏，为时不晚。

“小确丧”的背后

日报观点

“我想我差不多是条废咸鱼了”“什么都不想干”“颓废到忧伤”……如今，曾经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年轻人中流行的“小确幸”不知何时起变成了“小确丧”，甚至有人称之为“丧文化”：一种不想工作、漫无目的、情绪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地活下去的颓废心态。

这种现象引起不少媒体担忧，舆论大多规劝年轻人要建立积极健康的心态，不要落入颓废虚无的境地。这的确是一番好意，但其实也不

必对“丧文化”的一时流行过于忧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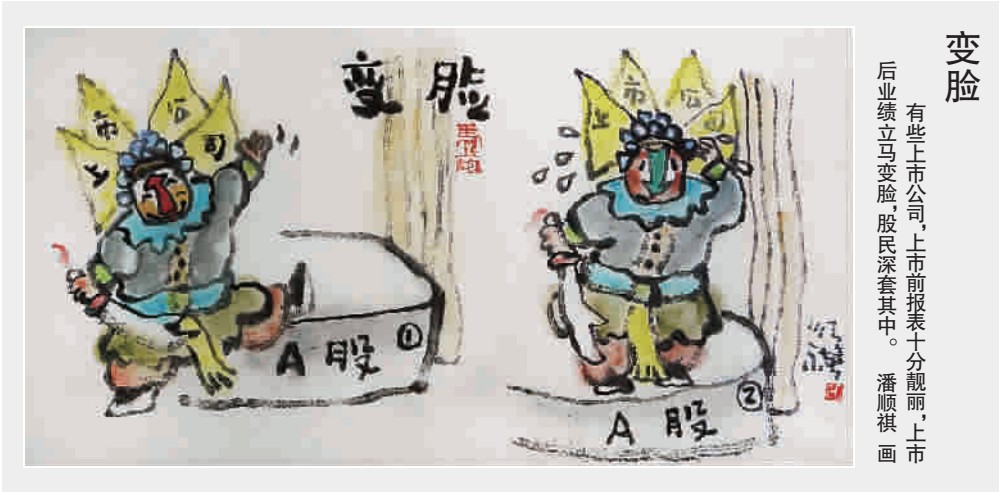
如果认真梳理当前流行的所谓“丧文化”，可以发现，其实不少年轻人喜欢的“丧”，和外界对于“丧”的解读，有着微妙的区别；最明显的一点是，其实“丧”不等同于负能量，“丧”也不意味着绝望，而大多是作为一种自嘲和排解压力的方式。

当然，也并不是说“丧文化”不需要关注，“丧文化”的萌发的确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

不久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上世纪 90 年代他在韩国教学，韩国学生跟他谈过一个体会：以前，韩国年轻人都不喜欢日本的音乐和电影，

觉得里面所谓的青春残酷物语都轻飘飘、病恹恹的。但上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后，都喜欢了。因为在这十年里，城市的发展、汽车社会的到来、生存的变化，使人一下子体会到那里面的孤独、感伤和漂流。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生活在大城市中的年轻人也的确面临着他们的父辈不曾遇到过的新问题，孤独、渺小感、无力感也并非无病呻吟，如果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变成心理问题甚至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背后问题，或许才是社会应该真正去了解、关注和关心的。（长余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



自由谭

由美国主题景点协会(TEA)和国际专业技术与管理咨询服务提供商 AECOM 合作撰写的 2016 年《主题公园指数和博物馆指数报告》于近日出炉，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年度接待参观人数 755 万拔得头筹，成为全世界人气最旺、最受欢迎的博物馆。

统计显示，国博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共有 48 个展厅，收藏着 139 万件中华祖先留下的宝贵文物遗产，国博夺得 2016 年世界博物馆参观人数“之最”头衔，彰显着中国博物馆的发展水平与展陈质量。

近些年来我国博物馆文化有了长足发展，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博物馆要靠质量和特色取胜

尹卫国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达到 4873 家。博物馆是公共文化窗口，博物馆数量迅速增加反映了大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也满足了公众对博物馆文化的需求。但也要看到，像国博这样展品质量高的博物馆尚属凤毛麟角，许多博物馆存在着千人一面，缺乏特色，展品少，看头不大，或看不懂，讲解水平低等问题，难以吸引观众。

博物馆要有量的扩张，更要讲究质的提升，两者应相得益彰，所谓质就是办馆水平、管理能力等，只追求数量不讲质量，等于浪费公共财政和文化资源。一些博物馆质

量不高，既有实际困难更有责任不到位问题。博物馆是花钱的项目。据悉，中央财政近日下达补助资金 51.15 亿元，支持 2017 年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但相对于全国数万个公共文化场馆的经费需求，显然是不足的，因此各地方应高度重视对办馆经费、人才培养的投入，切实解决博物馆免费开放后遇到的实际问题，不能重建设、轻运营，把博物馆当作装点文化门面或文化政绩的摆设。

博物馆敞开大门，使观众能自由进出、汲取知识文化营养，但如何办出特色与水平，用高质量吸引观

众，则体现着办馆的智慧、能力与责任。博物馆要有人气，首先靠质量和特色取胜，不能千篇一律，万人一面，这就需要开动脑筋，在展出特点上做足文章，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奇，不仅让观众看得懂，还要有兴趣看。其次要加强对讲解员的培训，提高文化素养及演讲能力，拓宽知识面。第三，最重要的是责任意识。博物馆对公众的教化、熏陶与感染之功能与作用，主要是通过管理、展出与服务释放出来的，有了责任才能敬业爱岗，激发办馆的智慧。博物馆免费，但决不是“廉价品”，一流的管理与敬业不能缺失。



新民随笔

“游戏规则”

卫蔚

上周末，除了在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吸引国人关注的，大概要数在波兰召开的第 41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青海可可西里毫无悬念地进入今年的《世界遗产名录》，但大众或许不知道的是，因为开场就爆发的一场“火爆较量”，可可西里的入选被整整推迟了 2 个小时。

本次会议刚开场，巴勒斯坦根据《操作指南》第 161 条“紧急申报”程序，把“希伯伦老城”申遗列为第一项申报项目，由此引发一场“混战”。

“希伯伦老城”是何许地方？它位于约旦河西岸，有“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共同的圣地”之称，“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一段历史故事”，换句话说，目前“名义上由巴以共管，实际上被以色列控制”的希伯伦每一次被提及，都会牵动各方的敏感神经。以色列认为，一旦“希伯伦老城”由巴勒斯坦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巴方将在老城今后的对内管理和对外宣传中占得先机，因此坚决反对。之前巴勒斯坦数次邀请遗产委员会专家实地考察，都被以色列拒之境外。

由于巴以均不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因此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无论是事先做足了“游说”工作的以色列及其支持者，还是根据“程序正确”原则据理力争的巴勒斯坦及其支持者，围绕着是否将“希伯伦老城”直接列为世界遗产，展开了一场白热化的争夺，最后大会主席甚至只能苦苦哀求两位代表，让他们能正常开展组织投票的工作。

最后，21 个委员国逐个上台投票，“希伯伦老城”以 12 票支持、3 票反对、6 票弃权被直接列为世界遗产，以色列代表愤然离场。

了解完整个始末，不禁感叹，当今世界，影响力的争夺，早就从政治、军事力量，转变为文化渗透、舆论传播等话语权的争夺。这次，要不是有熟谙大会规则的黎巴嫩、古巴等委员国台前幕后支招，单凭巴勒斯坦要想“斗赢”有东道主波兰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大国以及多个有影响力的 NGO 撑腰的以色列，几乎毫无可能。

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也遭遇到一些不公待遇，我们是否也有一批在各色国际组织任要职、熟悉各种“游戏规则”、同时交到很多国际盟友的有志之士呢？或许，某些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新民新语

历史与戏说

范洁

历史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热播，口碑呈“冰火两重天”。支持者称之为匠心打造的“良心剧”，批评者则认为该剧“有明显历史错误”“人物塑造脸谱化”“洗白司马懿家族”。

争议虽多，却有一个共识：此前的艺术作品中，较少关注身为军事家、政治家的司马懿，多是将他作为烘托诸葛亮、曹操等的配角，《军师联盟》首次以司马懿为主人公，提供全新视角，讲述三国故事。

因为艺术创作，火了一个历史人物，并非个例。之前，《半月传》就曾“捧红”春申君黄歇，一时间除了“上海简称‘申’源自春申君”为人津津乐道，别名为“黄歇浦”“春申江”的黄浦江，更是被自然地理理解为黄歇开凿疏浚，言之凿凿。

近日，采写本报“阅读上海 100 胜·滨江十景”时，采访的几位文史专家均感叹，这大概是对黄歇、对黄浦江最大的一个“误解”。黄歇生活的战国时代，上海约以今松江和青浦为限，再向东便是大海，因此黄浦江是由春申君主持开凿的说法，明显不符历史。此外，有据可查，黄浦江的疏浚和扩容，归功于明初夏元吉、叶宗人等。

如何看待历史剧、历史传说与历史的关系？

近日，葛剑雄教授的一篇《谁会傻到通过游戏学历史》(原题为《历史的真实与真实历史的传播》)在网络热传，指出“对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戏剧、民间艺术，只要价值观念正确，对其人物、情节、褒贬就不必当真。只要它们有文艺价值，对民众有吸引力，就可以与真实的历史并行不悖。”确实，艺术作品只是一个窗口，不能因为生动逼真，就把“野史”当“正史”，公众走近历史，更多功课还在“剧外”。想了解司马懿，去读《晋书·宣帝纪》和《三国志》，想熟悉黄歇，去看《史记·春申君列传》，而不是听信“戏说”“演义”。

对于剧方，尊重历史是创作前提，人物有名有姓，不能张冠李戴、凭空杜撰；对于观众，艺术作品是一种“加工”，更是一种“再造”，莫把故事当事实；对于相关部门，则更应思考，如何寻找一种雅俗共赏、动静相宜的方式，传播与弘扬历史文化。